

# 明年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宽松格局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陈彬

2016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结构调整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外贸需求疲弱影响我国出口增长，这些因素都将对就业构成威胁，有可能引发新的失业问题。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将带来更多新增就业机会，国家对创业创新宏观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都将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 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

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对就业的滞后影响不容忽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经济仍处在一个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阶段，新旧动力的转换依旧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抵消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以至于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2016年的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至6.5%左右。由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明年的就业压力将更为凸显。

二是国际经济复苏的动能不足，通过外贸间接影响我国就业。世界银行在10月5日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新兴经济体2015年与2016年预期经济增长率分别下调至6.5%和6.4%，预计中国经济2015年和2016年将分别增长6.9%和6.7%。IMF在10月份发布的最新报告也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7月份的3.8%调低至3.6%。其中，发达经济体预期增速从7月份的2.4%下调为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预期增速从7月份的4.7%下调为4.5%。由此可见，今明两年的国际经济形势均不乐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外贸出口地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放缓势必将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影响，并最终影响国内就业的稳定与增长。

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缓解就业难，但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利。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下降，2014年15-59岁人口同比减少了371万人，所占人口比例进一步降至68.0%，分别连续第三年和第四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就业的矛盾。但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已经造成我国就业总人口增速的放缓，而作为要素投入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对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形成制约，反过来影响就业的增长。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率保持了高度的相关性，波动趋势基本一致。自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365万人的峰值后，经济增长率也开始下降。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1070万人，预计2015年和2016年仍将延续这一趋势。

四是科技革命带来新增就业机会，人才结构性矛盾凸显。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创新，网店、微商、众创空间等新型的创业就业形式蓬勃發展起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互联网+”战略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新就业形态将不断涌现，由此也将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过程中，对于技术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会明显增加。但是目前我国与用人单位要求变化相适应的技工技能人才依然相对短缺，这个矛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会更加显现。

五是宏观调控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对促进就业创业起到积极作用。2015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旨在促进就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全方位、多手段地解决就业问题。

## 2016年就业趋势预测

第一，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稳中略降。当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持续处

在历史高位，在经济增速缓慢下行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由于经济增长对就业存在滞后效应，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已经影响到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随着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未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必将出现下降。并且，随着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降低，每年需要解决的新增就业人数也将逐步减少，为此只需要根据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化维持一定的就业规模就能保持社会就业的稳定。初步预计，2016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规模维持在1000万人以上，但低于2015年约1300万人的水平。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随着我国人才红利的陆续释放以及生产活动向高端制造、研发、设计等领域拓展，人均劳动生产率将实现大幅提升，进而带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收入倾斜。同时人口增速的放缓将使得人均收入水平的摊薄效应降低。因此，未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仍将维持快速增长。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变动的高度相关性，2016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将比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经济增长率，预计为7%。农业生产经营效率随着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而提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抵押权改革后农民将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城镇居民。预计2016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长6.3%和7.6%左右。

第三，劳动力市场将总体保持宽松局面。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就业市场总体的求人倍率始终高于1，说明我国就业市场已经由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的状态，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新经济业态的不断出现使得就业机会和岗位都增加了；二是由于总和

生育率降低，使得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减少，由此也缓解了就业市场上的供求压力。预计2016年我国就业市场继续维持宽松局面，求人倍率仍然将大于1。

第四，适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从2014年实际生育情况来看，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了47万。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波效应，新生人口增加在短期内可以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更明显的作用要等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预计2016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至67.3%上下，加上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后，怀孕及照料孩子会使劳动力减少或劳动力的有效劳动时间减少，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问题将更加突出。

第五，重点群体就业难问题依然不容忽视。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维持宽松局面，但是重点群体的就业难问题依然不容忽视。虽然统计数字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增长明显放缓，但农民工的大部分仍然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工作，面临频繁转换工作岗位的问题，就业质量较低。

为了进一步做好未来的就业工作，实现稳定就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深化就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科学评估人口生育政策变化的影响，保证经济增长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加大力度扶持创业创新活动，推动形成创业带动就业的热潮；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延长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强化职业培训提升就业技能，增强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站在供给侧改革的创新风口

□陈炜嘉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增速的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要素供给面临刘易斯拐点。传统要素的快速货币化导致的过度资本投资，推高债务成本的同时，拉低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在产能过剩和传统要素供给面临越来越强供给瓶颈约束背景下，依靠传统要素增量投入实现经济总量外生扩张的需求管理模式，难以突破当前宏观经济周期下行压力。

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善要素报酬分配机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释放要素供给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传统要素组合，将先进科技融入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善单位要素边际生产效率，提升宏观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必然选择。

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看，传统“三驾马车”的拉动效果呈现动力递减特征。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下滑，由33%的增速降至2015年10月份的10.2%，其中新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10.1%，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降至8.3%。2009年以来，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相当于将GDP向下拉动0.4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50万亿元，企业存款超过40万亿元，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处于较低水平。

在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并存

压力下，宏观调控思路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寻求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势必需要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支持。观察宏观经济周期轮动规律，任何长波宏观周期均有一系列中长期周期波动构成。从3年左右的库存周期到10年左右的设备投资周期，恰是当前宏观经济需要克服的困境。通过技术创新带动新一轮宏观经济景气将是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着力点。通过优化技术创新环境，支持传统企业技术改造，消化过剩产能，鼓励全社会资本参与改革创新，激发经济活力，启动宏观经济新周期。

经济周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传统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使得创新的机会成本降低，在逆周期宽松货币环境下，企业家乐于投资技术创新活动，一起通过创新降低要素使用成本，扭转经济困境。因而在经济下行至经济触底阶段，容易出现创新活动的相对活跃期。“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从创新角度解释了经济从衰退到复苏的动力源泉：业绩不佳的企业会被淘汰；资金从衰败的行业撤出，转而投向新兴行业；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也会向更有实力的雇主流动。历史经验证明，对于那些有资金、有想法的企业，经济衰退可以为它们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从1929年到1936年，美国企业每年成立至少73个内部研发实验室，用于新技术研发创新。

2014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传统产业财务杠杆压力加剧，企业

盈利能力下降。伴随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以创新交易方式和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内容的一轮新的创新创业热潮正在兴起，并引导社会资本重新平衡资源配置。以PE/VC投资为例，无论是投资案例数还是投资规模，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从小规模的创新活动到大规模的创新热情，创新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集中爆发。一项创新活动从发明到投权应用进而最后产生经济效益，往往需要3-5年时间，因而经济会在创新活动达到峰值之后逐步走出衰退步入复苏，并在进一步的投资带动下回归经济繁荣。这个过程，也是以技术创新消化过剩产能，继而通过制造业部门生产设备升级，带动产品和消费升级的过程。

优化现有要素组合，提高要素产出效率，改善储蓄投资转化率并改善当前就业环境的有效手段，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创新，提高创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效率，促进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需要至少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创新行为必须以改善和引导需求为导向。创新企业和创新企业家的使命，是通过创新性模式，前瞻性发掘人们的各层次需求，积极响应并有效地实现客户需求。借助深入的大数据分析，发掘用户潜在需求和前瞻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并进行商业化实现。从近年PE/VC投资行业分布上看，信息技术行业、消费行业、金融服务行业及医疗健康行业等与人们生活需求相关的行业创

新，均得到社会风投资金的认可和追捧。

以多层资本市场丰富民间资本参与创新的方式。创新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资金问题，技术资本化是促进和支持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与民间社会资金的结合，创新先进技术资本化的手段，使创新技术在实际推广和产业化之前，能够借助资本的力量，撬动未来发展动力。健全新三板交易和流动性机制，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在分配方式上向创新要素倾斜。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不足，便是在要素收入分配上难以做到效率和公平的兼顾。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资本要素过多向工业化倾斜，人为低估传统要素成本的结果，必然导致要素低效率投入和产能的高度重复和过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必须建立在优化要素分配效率上，通过科学可持续的要素报酬分配机制和风险报酬补偿机制，激活优势要素供给，引导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创新要素生产。

完善创新行为风险退出机制。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鼓励和支持创新的同时，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创新行为的风险退出机制，防止过度模仿和低效率创新。防止一窝蜂式的激情创新，鼓励经得起市场甄别和考验的、有潜在需求支撑的创新。在支持创新发展过程中，通过有偿的和激励相容的资本支持模式，防范低效率创新。

## 不宜高估美联储升息带来的冲击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广

美联储升息将导致全球性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重估。一般而言，美联储升息将导致美元指数上升和世界经济放缓，从而导致主要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下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国各类资产价格无疑也将受到影响。不过，鉴于各项影响因素的存在，不应高估美联储升息带来的冲击。

## 升息影响或被消化

针对市场普遍预期的12月的美联储升息是否会导致世界主要商品和资产价格进一步持续下跌，可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首先，对美联储的升息市场已经预期了一年多时间。因此，市场各方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在充分预期的基础上，12月美联储的可能升息对各类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冲击或已经被消化。

这一点可以从11月8日市场反应来得以佐证。当时，美联储公布的10月FOMC会议纪要后，各类资产一反常态，美股、债券上涨，黄金、原油价格上升。10月FOMC会议纪要显示，绝大多数委员认为12月会议上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其次，一年多以前，美联储就在讨论升息问题，但久拖不决。从美联储升息一拖再拖的决策举措来看，和前几次决策相比较，美联储可能考虑到更多国内外各种因素，如经济的复苏并不持续稳定等，美联储的升息决心并非相当坚决。从通货膨胀率指标看，前几次升息，全是在美国的核心CPI超过2%的情况下实施的，而目前美国的核心CPI指标仅仅在1.8%左右，因此升息的条件并不十分完备。美联储即使在12月将美国拉入升息周期，但在力度上可能比市场预期要温和得多。

第三，今年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地缘因素和经济影响，国际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跌，部分商品价格已经跌破采挖和冶炼成本，包括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针对2%的一定程度调整。因此，12月美联储可能采取的升息对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冲击，或因此比预期要温和得多。但有一点是可能的，即美联储升息有可能推迟这些主要商品和资产价格复苏的出现。

第四，和前几次美联储升息不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因此在考察和研究美联储升息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影响的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因素。如果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美联储升息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消极影响。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美联储升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是少数几个近年来始终保持升值的资产。美联储升息和人民币目前的降息形成了明显错位，因此，美元和人民币的利差可能缩小，或导致“热钱”的流出，短期内对人民币进一步形成贬值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是保持高速增长，因此，对长期资金而言依然有吸引力，大量资金的持续流出可能性比较低。人民币汇率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出现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汇率风险进一步显现。

在对国内期货品种的影响方面，总体来看，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商品可能影响比较大点，如黄金、铜、小麦等。而对国际化程度比较低的产品，特别是国内独创的期货品种可能影响小点，如PTA等，这些商品的价格基本由国内因素决定。

## 金价短期受冲击难免

美元升息，将导致美元升值，对另一种国际储备资产——黄金而言，其价格会带来一定冲击。但也应看到，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以及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黄金价格已经持续下跌多年，现在已经跌到某些地区的开采成本附近，黄金供应因此会减少，金价下跌速度可能会放缓。地缘局势不稳定，也对黄金存在有一定避险需求。

研究表明，黄金的开采成本在三年前就已经达到800美元/盎司，并一直处于直线上升态势，而目前黄金价格已经接近1000美元/盎司，价格和成本已经相当接近。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升息和美元上涨对黄金价格的利空影响可能相对不如此前预期的那么明显。

## 国债期货不会受到根本性冲击

国债期货自上市以来已经2年多，品种也从单一的5年期品种增加到10年期品种。两年来，国债期货交易总体平稳，在价格发现和对利率风险管理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国债期货在管理利率风险和价格发现的作用会得到进一步体现。从国债期货的参与主体来看，机构客户正趋于多元化，由最初的以证券公司为主逐步扩展到私募等机构投资者，交易策略也日渐丰富。

和市场化国家的利率期货市场相比，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空间相当广阔。2014年，美国国债期货日均成交约3000亿美元，德国国债期货日均成交约1500亿欧元，占现货市场成交金额比例分别为67%和743%。2015年10月以来，我国国债期货日均成交383亿元，同期利率债日均成交约1970亿元，期货与现货成交占比不到20%。

鉴于上述背景，可以认为，美联储升息对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的影响相当复杂。首先，尽管我国处于降息周期，而美国开始进入升息周期，中美间利差水平在缩小，但这个利差还是存在的。数据显示，尽管中美间一年期的利差在缩小，但中国一年期的利率依然比美国高2个百分点左右。

影响国内国债价格和国债期货价格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是国内的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美国的利率水平和政策尽管对国债市场和期货市场有影响，但仍属于次要因素，不是决定因素。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迎来的降息周期并没有结束，因此，国债和国债期货市场依然存在上行动力。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此外，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美联储升息早已经被市场所预期，我国的国债期货价格已经反映了市场这一预期。还要分清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不排除美联储升息短期内会给我国国债期货走势带来冲击。但从长期看，支持国债价格的基本面依旧存在。美联储升息难以构成根本性影响。

# 住房成本税前抵扣“一石多鸟”

入群体收益，但该政策也使得平均税率（全部个税/全部应税所得）下降。同时，低收入人群没有明显受益于提高“免征额”（税率保持为0）。但是，若不提高“免征额”，名义收入增长会使更多工薪族进入纳税人行列，或由低税率层级进入高税率层级，阻碍了中等收入人群壮大。同时在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亟待改革个税制度。

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就是从目前的“分类计征”（11类个人收入分别规定起征点和税率累进）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计征的税制转变，改变目前“分类征收”模式下，富人征不到税、个税沦为“工薪税”的现状。

在个税的“综合计征”制度下，为了体现公平税负和“保低就高”的原则，在一定额度内，允许个人将维持家庭“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费用在税前从应税个人收入中扣除。从多国实践看，扣除项涉及定额或定比率的食物费用、住房（第一套房）贷款利息、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基础教育支出和保险费、赡养费用等。税前扣除基本生活负担，在于这些费用既是维持国民身心健康的基本投入，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和涵养税源的必要投入，不应该纳入应税所得。

在新的税制下，将个人工薪、经营、劳务和稿费等收入综合起来按同一个累进税率表征税，而为了吸引投资和留住资金，将资本所得单列分类计征，继续适用比例税率。同时，完善“税前抵扣”，将居民基本生活费用税前扣除。这样，低收入人群的税率将明显降低，而高收入人群的税负将增加。此外，对于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所得，依旧采用分类征收模式，也不会挫伤投资的积极性。

近日，某高校发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资产报告》显示，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据70%。随着房价快速上涨，按揭贷款在近年来已成为居民最大头的支出。同时，“十三五”有两个重大目标：一是将已是在城市就业的2.7亿外来人口纳入城市户籍，二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降低外来人口城镇化成本，则是实现这两项目标的最大公约数。

外来人口市民化后的首要需求就是“安居”，但“衣食住行”中住的支出最大。如果能够将基本住房费用在税前抵扣，无疑将极大地降低外来人群市民化的成本。以个税改革为契机，将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税前抵扣，将是增强城镇人口集聚能力，